

#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成立暨发展规划座谈会综述

陈宇慧 归泳涛

2013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成立暨发展规划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名誉院长、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研究院理事会的多位理事,国内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专家学者,北京大学相关院系的代表,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副院长袁明主持。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就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新特点、中国外交的历史经验及启示、国际战略格局与中国的全球角色、全球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等议题发表看法,并就研究院应当重点研究的方向和问题提出了建议。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中央外办原副主任、解放军原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陈小工就中国国家安全,特别是网络安全面临的新形势发表了见解。他认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在两个层面上具有新特点:一是传统安全领域出现了新情况,如东海、南海等问题的变化,需要在外交、国防等方面有新的对策;二是新的安全问题凸显,如太空、网络、能源、人口等。这些都是重大战略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陈小工重点阐述了对网络安全问题的看法。他结合三峡大坝计算机系统的安全保障等实例,指出网络安全具有全局性、关键性和隐蔽性的特点。他指出,核心网络一旦受到攻击,后果之严重不亚于核攻击。大国之间如在这一问题上发生误解、误判,有可能引发网络战乃至于军事冲突。当前,美国正投入大量资源,加紧发展网络战力量,并制定相关条例规则。对中国来说,一是要发展自己的网络技术和力量,要具

---

\* 陈宇慧: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归泳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邮编:100871)

备侦察、攻击和防御的能力；二是要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不能让网络世界无序发展。

围绕中国外交的历史经验及启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指出，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动和中国改革的阶段性转变，新时期中国外交出现新特点：一是外交形象更丰满，也更复杂了，国家形象的代言人除政治领袖外，还包括了更多的普通人；二是中国对外关系正进入一个长期敏感时期，如何顺利通过这一瓶颈期至关重要。他指出，中国外交的基本诉求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体现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冷战时期提出的，之所以到现在还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本身包含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内容，包含了平等原则，有道德方面的诉求。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更多了，一些周边邻国在非官方场合提出了对“周边”一词的质疑，认为这个说法带有以中国为中心的色彩。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外交需要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找准自己的定位；需要以办好中国自身的事情为主，根据国内发展的需要制定外交政策；需要贯彻务实精神和灵活性。章百家引用周恩来总理强调的“不骄不躁”、“耐心等待”、“细致工作”和“善择风向”、“善择时机”等外交语汇，以及中国处理中日关系、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历史经验，指出在外交实践中长期耐心地做细致工作的重要性。他还提议，国际战略研究院可以在外交的普及教育、研究外交和内政之间的密切联系等方面开展工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崔立如就国际战略格局与中国的全球角色做了发言。他认为，当前国际格局的特点是权力分散、相互依赖。大国之间利益攸关，既竞争又合作，中国需要在博弈中寻找平衡。他指出，中国的和平崛起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外交应该从防范反应型转向进取塑造型，其中包括政治竞争力的加强。过去我们依靠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取得了成效；但现阶段需要转变观念，中国模式回避不了政治，政治要与经济、安全等同步。此外，中国还需要参与、引领及构建国际规则，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以树立新时期的大国形象。在亚太地区，东盟主导的地区一体化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两个并行的机制，中国应该在不引发“中国威胁论”的前提下平衡经济与安全上的利益。崔立如建议，研究院的工作应区别于政府职能部门，把重点放在中期的研究课题上。他提出两个值得研究的方向：一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全面检讨，这不意味着否定过去，而是英文中所说的 review，即回顾和总结；二是对新时期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评估，国内目前的相关研究还过于笼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对世界经济的现状和前景作了评估和分析。他指出，过去一年，世界经济增速大大低于人们的期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比人们想象得更为紧密。发达国家通过传统的货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空间大幅减小，高负债、人口老龄化和党派政争等问题导致其经济恢复乏力。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过去一段时间的高增长部分地源于

发达国家的低利率,但如今资金回流发达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他预测,短期内中国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美国调整货币政策、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增大,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等。

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强调,2013年7月以来,中国经济拉开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序幕,中美同意开展双边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其影响将不亚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此外,上海自贸区、东盟-中国的“10+1”升级版,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等一系列新提法、新动作,都需要战略和政策研究跟进。他提出,国际战略研究应该与经济密切结合,比如:应该评估新的贸易、投资协定可能带来的风险,把握新时期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应该比较多边和区域这两大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研判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找准中国的道路;应该厘清中国自身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角色,研究在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多边经贸体制中各国的分工和领导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着重提出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地方因素。他提出,在当前中国的大战略考量中,低估了沿边省区和相关邻国重要关系,认为这影响了国家安全和顶层设计。他建议重新审视对地方省区的战略定位,国家战略研究要深入地方,现在相关省区已经具备这方面的软硬件条件,应该与国家智库携手进行这方面工作。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韩保江也以缅甸为例,指出沿边研究的重要性。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关贵海则以同俄罗斯的边境交往为案例,指出在制定沿边战略的过程中,地方省区能参与的决策空间很小,在涉及对口国家的策略制定上,也很难把握,因此,不能确定地方层面能否为中央决策做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认为,在沿边各省区对外开放的差异性和中央统筹决策方面,可做更多调查研究。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对智库的运作与国际化发表了看法。他说,新形势下智库也要转型和发展,要成为中国人介绍中国经验的权威诠释者,外交安全理论、战略和政策的诠释者,以及外交方面一些重要论坛的承办者。他希望中国的智库能够内外结合,在解释中国政策时做到客观、理性和权威,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民间主办、官方协助”的优秀论坛的发展,政府官员也应该改变过去只念讲稿的模式,多参与论坛中的互动。此外,一流智库应拥有一流的平台,要下大力气建设智库的网站与数据库,向世界水平看齐。而官方也应该利用智库作为其政策规划和前瞻性理念发布的窗口,智库人员可以在其中参与前期导读和公布之后的舆论引导工作。

张蕴岭在发言中强调了中国的“定位”问题。他认为,要构建周边战略依托区,相关利益和机制的确立都需要明确定位。此外,对战略形势的判断也很重要,中国目前取得了近百年未有的良好局面——伙伴关系、共赢市场、多重空间——这些都有利于我们推动自信、自强、创造性的共同发展。他还提出,应该“抓大控小”,在地区矛盾中抓住主要国家,解决复杂问题。另外,他认为当下不是打破美

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旧金山体制”的时机,这方面尚没有明确的后续策略跟进;在海洋战略方面,中国首先应该争取的是海上航行自由而非划界,前者才是新兴海洋大国的理性选择。张蕴岭还对战略研究的方向发表了看法,指出除了前瞻性之外,依托于大学的智库还应该提出部分反证,以便评估外交政策的成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朱文莉提出,历史和文化因素在战略体系中的地位重新得到提升,单纯强调军事或者安全的战略研究已经不符合新形势的需要。对这些因素的研究可以成为学术界对战略制定所作的贡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建议,研究院的工作从实地调研开始,除了专家学者外,也可以发挥学生在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方面的积极性,形成较为齐整的研究团队。

戴秉国同志听取了与会者的意见,并参与了讨论。他鼓励学者认真、务实地研究中国面临的国际机遇与挑战,积极向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建议。